

贤哲自述丛书

韩非子答客问

韩非子答客问



贤哲自述丛书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陈 伟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贤哲自述丛书

郭志坤 主编

陈伟 撰

韩非子答客问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非子答客问/陈伟撰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2

(贤哲自述丛书)

ISBN 7-208-03917-8

I. 韩... II. 陈... III. ①韩非-生平事迹-问答

②韩非-哲学思想-问答 IV. B226.5-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5097 号

责任编辑 张美娣

封面装帧 沈兆荣

周剑峰

插图 庞先健

美术编辑 邹纪华

贤哲自述丛书

韩非子答客问

陈 伟 撰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7.5 插页 5 字数 157,000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,100

ISBN 7-208-03917-8/K·913

定价 17.40 元

“贤哲自述丛书”总序

才德佼好谓之贤，识见超人谓之哲。在漫漫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，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贤士哲人。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，闪烁在万里碧空，犹如擎天的立柱，支撑着华夏民族的大厦。贤哲，我们民族的精华；贤哲，我们民族的骄傲；贤哲，我们民族的象征。我们不能没有这种精华；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骄傲；我们不能没有这种象征。一句话，我们不能数典忘祖。对每一个中国人——哪怕是最普通的中国人——来说，都有一个了解、熟悉民族的贤哲，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精神养料的问题。

这些年来，对贤哲的介绍也不是一片空白。对其人其事作一些浅层的表述，有的还加以某种演绎和图解，这样的作品还不少见。应该承认，这也是有益的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必要的。但如果仅止于此，就不怎么可取了。对贤哲的人生历程，大事渲染，音容笑貌，绘声绘色，或高，或矮，或胖，或瘦，一一刻画得栩栩如生，那样做，说到底也只是触摸到了贤哲的外在躯壳，至于贤哲的内在气质是没有触及的。那样的作品尽管也可热热闹闹，风靡一时，但对承继民族传统及精华，似乎不相干。

贤哲的内心世界是一座高度学术化的宝库。打开这座宝库，展示这座宝库，把宝库中的一件件学术珍品向世人作

一点介绍、剖析,使人们懂得:哦,我们中国的历史宝库中还有那么多好东西,我们可不能自贱自卑呀!进而学会从这一宝库中吮吸养料,以充实和完善自己。

我们正在着手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把学术和文化送向民间的工作,让哪怕是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也懂一点“学术”。历史上人们每每称道“学术下移”,这,也算是吧!

要让学术深入于民众之中,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适宜而贴切的表述形式。

我们取的是让贤哲自己站出来讲话的“贤哲自述”的形式。

贤哲已长眠于地下千百年,逝者无言,何来“自述”?不,那样看似太简单化了些。从肉体角度看,贤哲们已消失,已逝去,起逝者于九泉之下而“自述”之,岂非天方夜谭!然而,贤哲之为贤哲,是因为他们的论著犹存,他们的精神没死。千秋评说,涉足于史海学坛的弄潮儿,总是要唤起先辈贤哲的英灵,来表述自我的心迹的。鉴于此,我们何不将贤哲的英灵请到前台来,让他们“自说自话”一番,详言其身世、际遇、学说、业绩,甚至对后人的千秋评论发表一点“感言”,如此这般,岂非妙哉?!

当然,我们的主旨还在于介绍,但这是浅化学术的介绍,这是深化内涵的介绍,与一般的介绍文字不尽相同的。

既然是“自述”,那么势必有问有答了,有“客问”,也有“贤哲答”。“客问”提出的是学术界、社会上关切的诸多问题,有些是常年争讼不休的“热点”、“难点”,决非隔靴搔痒。“贤哲答”,实际上是让贤哲超越时空,站在今天读者面前作面对面的答疑,既解答生平、事迹、思想、理论,也可评判历代研究者的种种评说。答疑涉面可以广泛,但都恪守“言之

有据”的原则。所答内容大致上是学界的定评和定论，也有一些是笔者长年研究的心得所在，只是托贤哲之口道出罢了。

在撰稿过程中，我们深感这种将古人“起死回生”的表述方法，对“学术下移”是大有益处的。一是生动、活泼，使历代贤哲直面读者，对读者来说，那是如闻其声，如睹其人了；二是可熔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，比起那些单纯的图解和表层的介绍来，要“沉甸甸”得多，称这些文字为“浅化了的学术专著”，不为过。

参与撰写这些“贤哲自述”的，不少是学界的佼佼者。他们深感写这样的文字，比起写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来并不轻松，因为那要浅化。浅化是件难事。深入才能浅出。你如果不深入，一味求浅，说不准会将贤哲的鼻子眼睛给描歪了。再说，“深入”了也不一定能“浅出”。“深入”有道，“浅出”有术。这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方法问题，也有驾驭文字的功底问题，于此，几多学术巨擘还自叹“浅出”无方呢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正在学习，正在摸索。当我们把这套丛书一本本地推到读者面前的时候，是否会得到读者诸君的赞许和首肯呢？我们期待着肯定的回答。

郭志坤

1997年5月1日

目 录

第一章 身为诸公子 孤愤干韩王 1

“畸致乏援”的韩姓同宗公子——为人“口吃”，少言务实——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——师从荀卿，学“帝王之术”——面对风雨飘摇的韩国局势，上书“干韩王”——进言不用，孤愤著书

第二章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29

亟需高扬君权——“要在中央”，大权该由君主独揽——“圣人之道，去智去巧”——破“成奸八术”，使奸人无遁其身——“事在四方”，臣民的责任在于办事——“守业其官”，各级官吏都要恪尽职守——严禁“越官”而功，“越官则死”——“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”

第三章 以道为常 以法为本 51

探求治国之道——实施“以法为本”——承袭，熔铸，改造，发展早、中期法家理论，将它推向极致——因“物理之势”而制法——“明法者强，慢法者弱”——强化法之公开性、公正性、统一性、稳定性、权威性——智法之士：护法的勇者、执法的角士——让人主摆脱“重人”设下的重围，走法治之道

第四章 君执柄以处势 主有术而御臣 91

熔法、术、势三者于一炉——君执柄以处势——“中人”之“人为之势”——权势不可借人——君主恃势不恃信——主

有术而御臣——术忌“浅薄而易见，漏泄而无藏”——“挟智而问”，使“术”走向智谋状态——“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”

第五章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…………… 119

反对和批判“私学成群”的儒家教育——主张和提倡“听吏从教”的法家教育——“废先王之教”——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——“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”——“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”——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——韩非虽未获用于世，而于“焚书坑儒”难辞其咎

第六章 重农固本 强兵备战…………… 145

“富国以农，距敌恃卒”——争于气力之世，明君必“务力”——“无事则国富，有事则兵强”——养成“耕战有益之民”——以利驱人：耕者富，战者贵——灭“六虱”，除“五蠹”——务农者应常作于一业，常守于一地——重视“人为”在农业中的作用——强兵甲以“备害”——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”

第七章 奉命使秦 受嫉被害…………… 171

“观往者得失之变”，韩非为文十余万言——秦王见韩非文，叹不见其人——韩非被迫出使秦国——上书秦王，献“存韩”之策——李斯、姚贾告诉秦王，“非终为韩，不为秦”——秦王“下吏治非”——韩非被毒死于云阳狱中——韩非死后，韩国随之而亡

第八章 韩子之亡千古悲 “法不阿贵”万代行…………… 193

两千余年来，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若隐若现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——“期于利民”、“以刑去刑”的立法思想——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的执法原则和“治吏不治民”的法治思想——“处官者毋私，使其利必在禄”，意在反贪倡廉——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，必然走向文化专制主义——严刑峻法，疏于教化，势必导致社会动乱

附 录

一、韩非子年表·····	230
二、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	232

目

录

第一章

身为诸公子 孤愤干韩王

『畸致乏援』的韩姓同宗公子——为人『口

吃』，少言务实——『喜刑名法术之学』——师从

荀卿，学『帝王之术』——面对风雨飘摇的韩国

局势，上书『干韩王』——进言不用，孤愤著书

客问：韩非先生，关于您的生年，笔者不想在此多花笔墨了。由于史无明文，学者虽多所考证，但至今尚无定论。人们大抵参照您的同学李斯的生卒行年，揣测您的生年。有人以为您生于公元前 280 年（韩釐王十六年），有人以为您生于公元前 295 年（韩釐王元年），还有人推算您生于公元前 298 年（韩襄王十四年）。反正相去不远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这里采用钱穆先生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的推算法，定为公元前 280 年，到公元前 233 年您被害身亡，您的寿限为 48 岁。这都不去论它了，比生年更重要的似乎是您的出身，那可是对您一生都产生影响的。先生，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告诉我们些什么呢？

答问：我出生于贵族家庭，那是没问题的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：“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”（《老子韩非列传》）“诸公子”中的“诸”，照字面解就是“众”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众多韩姓同宗公子中的一个。这个“诸公子”的地位怎样，《史记》略而不述。

不过，后人还是从我的生平行状中揣摩出了“诸公子”一语的真味。蔡元培在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中，说我是“韩之庶公子”，将“诸”衍成“庶”，实在是颇具深意的。中国历代的帝王，都明目张胆地实行多妻制，除元配妻后外，还有众多的后宫妃子，这样，帝王的子女以数十、上百计，其“诸公子”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则是“庶公子”。我作为一个堂堂韩国公

子,不能直接参与议政,不能面见父王,只能以上书形式“干韩王”,其地位只能处于“庶公子”之列。明人王道焜在《重刻韩非子序》中说得更透彻,认为“韩为疎属公子,畸致乏援”。“疎”通“疏”,可释为不亲近,即远亲。这里点出了我是韩王家族中的远亲,名为“韩公子”是一般世俗的尊称,事实上与韩王国的权力层不相干。“畸致乏援”一语,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我的处境,一旦遇到什么缓急之事,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情状。清人王先谦说我“宗属疏远,不得进用”,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。

客问:笔者读过一些法家人物传记,发现不少力主改革的法家人物都出生于小国、弱国的没落贵族或贵族远亲之家,这难道能说是历史的巧合吗?

答问:您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。比如,法家先驱人物子产,出生于郑国的没落贵族之家,郑国的力弱勢单那是不待言的。申不害,出生于为楚所灭的姜姓弹丸小国申国的贵族之家。鼎鼎大名的法家人物商鞅出生于卫国,据《史记》本传记载为“卫之诸庶孽公子”,是卫侯在民间留下的一笔血亲孽债。我韩非的境况也极相似。

小国、穷国、弱国的失势贵族子弟,易于接受法家学说,并成为积极的社会变革推行者,有其必然之理。得势贵族子弟养尊处优,为声色犬马所驱策,难以成其大器。尤其因为这些人处于权力和政治漩涡的中心,往往“当局者迷”,对社会大势不甚了然。而失势贵族子弟,尤其是那些小国、穷国、弱国的“庶孽公子”,他们从小受过较好的教育,生活上清贫自律,思想上敏捷锐利,他们看得较远,看得较透,他们不在权力和政治漩涡中心,他们较少生怕失去些什么的患

得患失之心，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家国危亡之祸害，正像清代一位学者王先谦在《韩非子集解序》中说的，“韩非烛弊深切”。正因为对社会弊端洞若观火，我韩非及其他法家人物就势必会不顾一切地力主法治，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。

客问：在太史公为先生作的短短不足四百字的传记中，专门写上“其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”数语。不知先生是如何看待“口吃”这一生理缺陷的？

答问：首先我想纠正一下您的一个提法。您认为“口吃”只是指一种生理缺陷，不是的，至少太史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。太史公说的是“其为人口吃”，请注意：“口吃”是与“为人”连在一起的。太史公要说的是：韩非不太能讲话，见了人（尤其是见了生人）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常常由此而“口吃”起来。这是一种“为人”，一种微妙的心理状态。

从“为人”角度看，太史公笔下“不能道说”者是一个群体——一个为太史公津津乐道的群体。这一群体实际上与“滔滔以言”、“虚言惑众”者形成对比。太史公本人交往并称道的也是这一群体中的人。

郭解，大侠，“其人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采者”。外貌不漂亮，又不会讲话，可“天下无贤与不肖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声”。

李广，著名的飞将军，使凶暴的匈奴也闻之丧胆，可“其人恂恂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说”。李广外貌看上去像个乡下人（鄙人，即乡下人也），又不会讲话，可他绝对能打仗。

苏建，号为“游击将军”。其人亦“口不能言”，但他敢于“面责大将军”，敢于对如日中天的卫青、霍去病说“不”！

把我韩非纳入这样一个群体，是我的光荣。从太史公

的行文中，似乎看到其对我韩非少言、务实风格的肯定。由此可见，太史公笔下的“口吃”云云，是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生理缺陷的，本质上讲，太史公是在推崇一种“为人”作风——讲的少，做的多；不讲空道理，脚踏实地地读书、做学问。

可惜，两千年来，多少研究者只是将“口吃”看成是简单的生理缺陷，还演绎出一番“正因为口吃，因此只得求之于笔墨写文章”的道理来。这是不确的，也是肤浅的。

客问：这里想讨论一下读书做学问的问题。一般贵族人家都十分注重于子女的学习。在《史记》的本传中写上了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一语。无独有偶，日后作为您同学的李斯也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。你们二人既有同好，可在志趣和追求上是否一致呢？

答问：这个问题学界早已注意到了。可以说，我与李斯是同学而不同志，不然日后怎么可能会成为生死政敌呢？可以说，李斯是我韩非的一面镜子，用这面镜子一照，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来。在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中，有那么一段话：

李斯者，楚上蔡人也。年少时，为郡小吏，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，近人犬，数惊恐之。斯入仓，观仓中鼠，食积粟，居大庑之下，不见人犬之忧。于是，李斯乃叹曰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！”

李斯以鼠自喻，实属少见，可见其实为鼠辈无疑了。就是做“鼠”，他也要当“仓中鼠”，而不当“厕中鼠”。后来告别荀卿“西入秦”时，又进一步作了这样的表白：“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，久处卑贱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恶利，自托于无为，此非士之情也。”

李斯说了那么多，转了那么些圈子，实际上就是两句话：一、他的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（及以后的“学帝王之术”）是为了摆脱“卑贱之位”、“困苦之地”。二、为此，他必须“得时无怠”，抓住一切机会，采取一切手段，甚至不惜充当“游说者”而背离自己的祖国。

至于我韩非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的心志，可由《存韩》一文略见一斑：

夫韩，小国也，而以应天下四击，主辱臣苦，上下相与同忧久矣。修守备，戒强敌，有蓄积，筑城池以守固。

另外，在《安危》一文中，集中表达了我的政治理想，这也可以看成是我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的理想所在：

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，尽力于权衡，以动则胜，以静则安。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，爱身于为非。小人少而君子多，故社稷常立，国家久安。奔车之上无仲尼，覆舟之下无伯夷。故号令者，国之舟车也。

不妨将这段文字翻译成大家都能懂的白话文：要使天下的人都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竭尽自己的力量。那样，在战争时可以取得胜利，在平时可以使社会安定。安定的社会使人们在生活中乐于奉公守法，爱惜自身而不去做非法的坏事，坏人少而好人多。社稷得以永远设立，国家可以长治久安。狂奔的车上不会有仲尼这样的智者，翻了的船只下面不会有伯夷这样的廉士。而国家的法令就是船和车。

上述两段文字，是否可以归结出与李斯刚巧相反的两点来呢？一、我韩非的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，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，而是为了使社会“小人少而君子多”，使国家“以动则胜，以静则安”。二、我韩非十分重视祖国利益，我的学刑

名法术,我的以书“干韩王”,我的作为韩使赴秦,都是为了“强韩”、“富韩”、“存韩”。李斯说的“非,韩之诸公子也,非终为韩,不为秦”,从一定意义上理解,也是对的。

有学者对我韩非和李斯的品行和追求作了这样截然不同的评述:“韩非始终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,毫无官场斗争的实际经验,他怎么斗得过官场老手李斯、姚贾之流呢?韩非即使不死于李斯、姚贾之手,也会死于其他政治老手之手!”(阎韬:《诸子群书》)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。我韩非一开始就是一个书生,到后来还是个书生,而李斯一开始就不是个书生(你看他告别恩师荀卿时那番话),后来越来越不像个书生,浑身上下充满了铜臭味。李斯由小吏而长史,由长史而客卿,由客卿而平步为相,说其为政治老手,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而我韩非一生没当过什么官,也没伸手要过什么官,只是在那里按照自己理解的法家理论不断地鼓与呼。

客问:讲到读书做学问,我们发现先生不只是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,涉猎的面极为广阔,似乎涉足于当时的所有学术领域,这在诸子中是少见的。先生能否谈谈为学之道?也就是您在为学上有些怎样的心得呢?

答问:在读书做学问方面,我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。一条腿是在对各学派的参照对比中学习,另一条腿是在吮吸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习。前者是横向的学习,后者是纵向的学习。二者交互为用,从而形成自己的学识和见解。

先谈横向的学习。这里的“学习”二字是广义的,很大程度上包含有批判、比较、扬弃的成分。我写的《显学》篇,读者诸君可以看成是我读儒墨两家作品的读书心得。我研

究了“儒之所至，孔丘也；墨之所至，墨翟也”的作品，还研究了孔子后学子张之儒、子思之儒、颜氏之儒、孟氏之儒、漆雕氏之儒、仲良氏之儒、孙氏之儒、乐正氏之儒的作品，研究了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的作品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孔墨两家，名为“显学”，实为“愚诬之学”。“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……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把孔墨两大显学说得一无是处，现在看来是过分了，但我当时的确是这样以为的。

我花大量精力阅读了老子的书，《解老》《喻老》二文，完全可以看成是我读老子书的读书笔记。我对《老子》一书中的重要章节逐字逐句地进行了消化、理解、吸收，并加以自以为是的诠释。在读老过程中，我的思想和理论渐臻圆熟，并且使之渐次成为我的法家理论的基石。

《老子》一书又名《道德经》。我对“道”和“德”都赋予了崭新的涵义。何谓“道”？“所谓有国之母，母者，道也。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。所以有国之术，故谓之有国之母。”（《解老》）意思是说，所谓使国家强盛发展之母（根本）是什么呢？是道。有了道，才有治理国家的法术；有了这种法术，国家的强盛发展有了根本保证。何谓“德”？“凡德者，以无为集，以无欲成，以不思安，以不用固。”（《解老》）意思是说，凡是德，都是以无为来积聚，以无欲来成就，以不思虑求得安定，以不使用来获取巩固的。这样，“道德”二字，由老子的纯哲学的概念转向了政治生活、转向了社会生活，尤其跟法治的观念紧紧地衔接在一起了。我还把无为为主体的黄老思想与治人观念融会贯通在一起了，所谓“知治人者其思虑静”（《解老》）。可以说，我从老子那里找到了